



中国农业大学“985工程”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专著

启蒙与建设

当代中国媒介从业人员职业化路径探析

李红艳 著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农业大学“985工程”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专著

启蒙与建设

——当代中国媒介从业人员职业化路径探析

李红艳 著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与建设——当代中国媒介从业人员职业化路径探析/李红艳著.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2. 11

(中国农业大学“985 工程”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专著)

ISBN 978-7-5655-0615-4

I. ①启… II. ①李… III. ①新闻工作者-研究-中国 IV. ①G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9497 号

书 名 启蒙与建设——当代中国媒介从业人员职业化路径探析

作 者 李红艳 著

责任编辑 汪春林 童 云 何志勇

责任校对 陈 莹 王晓凤

封面设计 郑 川

出版发行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电 话 发行部 010-62818525,8625

读者服务部 010-62732336

编辑部 010-62732617,2618

出 版 部 010-62733440

网 址 <http://www.cau.edu.cn/caup>

e-mail cbsszs @ cau.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1 092 16 开本 23.5 印张 31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中国农业大学“985 工程”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
专著丛书编委会

主 任 何秀荣

编 委 叶敬忠 郭 沛 张 晖 汪春林
田维明 任大鹏 熊春文 李冬梅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以微弱的肩膀和坚韧的灵魂始终在路上温暖着我、支撑着我。

总序

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重文轻技是主流的教育观念。私塾、书院这类授业解惑的传统教育场所提供的是识字断文、填诗赋词、说史辨理直至治国安邦的文韬武略，而技术传授是以民间作坊私相授受的方式传承的。现代大学传入中国后，长期被视为“奇伎淫巧”的自然科学技术才作为学科传授登堂入室。从此，文理学科构成清末与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的学科双轮。纵观世界，尽管每所大学有自己特色见长的学科，但文理学科并设是绝大多数大学的学科架构。

1952年以后的中国却走上了一条仿效前苏联模式以专科性为特征的大学学科架构之路，即使像曾经拥有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李济、吴宓、冯友兰、张岱年、金岳霖、陈岱孙、潘光旦等一众人文社会学科宗师泰斗和曾经培养出汤用彤、梁实秋、钱端升、萧公权、钱钟书、曹禺、季羨林、吴晗、夏鼐、费孝通等无数影响社会的名家大腕的清华大学也被政府整塑成一所理工科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成了少数综合性大学或文科大学的特属品。大学的这种学科割裂设置使一大批大学缺失了人文学科熏陶和传承，被称之为“有技术无文化”的学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由于当时主流意识和政策将“科学”窄化为自然科学，年青学子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打上了“重理轻文”的烙印，当时最激励我们的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误以为社会只需要能创造有形物质的自然科学。与此同时，即使在有

限的人文社会科学空间中也实行了“过滤”政策,使得原本应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人文社会科学园地变成了“一花独开、万马齐喑”。

每所大学应当有自己的特色,虽不需要包罗万象地开办全部学科,但也绝对不应当在学科大类上极端地偏忽人文社会学科或自然学科。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在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进程中,文理学科互补和渗透是教育发展的规律,否则是不利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文化遗产的。

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虽然难以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容易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形式展现,但人们依然能感受到其对精神和思维方面的巨大作用。从塑造个人来说,哲学能帮助人们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史学能帮助人们以漫长的历史长河为背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文学能帮助人们更深刻、更准确地认识和表达;经济学能帮助人们以投入产出效率、资源最佳配置来思维;法学能帮助人们在社会秩序中依法行事;社会学能帮助人们更关注人类公平和疾苦;……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类作用,弗朗西斯·培根在1597年发表的《随笔录(论读书)》中就作了脍炙人口的表述: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自然哲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若说到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孔孟之道、老庄哲学不仅影响中国数千年,还深深影响着东亚,甚至远度重洋影响到欧美和整个世界;又如朱子理学、阳明学说至今仍被很多人信奉;成于明清时代的四大名著在中国家喻户晓、老孺皆知,“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句民间俗话就透发出其对社会的影响。放眼国外,从古代的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到近现代的斯密、李嘉图、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孟德斯鸠、凯恩斯、伏尔泰等,无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讲述过这样一个例子:二战时,德国图林根大学的一位校长向全校训话时说,学自然科学的孩子们抬起你们的头,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列车。于是,学自然科学的学生得意洋洋,人文科学的学生们都低下

了头,感到很没面子。突然,校长说,学人文科学的同学们,请昂起你们的头,高昂你们的头!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列车上的司机。回首最近半个多世纪的神州历程,重大“失误”基本上是发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导致后来不得不强制性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搞“大跃进”导致随后的全国大饥荒,闹“文化大革命”导致全面摧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拖垮国民经济。如果说自然科学影响社会的进步速度,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则影响社会的兴衰成败。

从人类思维角度来说,人文社会学科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具有浓烈的批判性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这也恰恰是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帮助最大的地方,有助于培养和提升人们的思维精神。中外历史表明,当一个社会缺失或扼杀了批判性思维精神和辩证逻辑思维精神时,这个社会就往往会堕落成一个奴性的愚昧社会或一个失去理性的过激社会。

马斯洛的人类需要论将人的需要划分为五类: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感情需求、受尊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从中可见,人类需求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显然,物质层面的需求主要由自然科学成果来满足,而精神层面的需求主要由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来满足。当今社会中,人们经常能听到这样一种说法:物质生活富裕了,精神生活空虚了。这表明人类不仅需要物质享受,也需要文化精神大餐。因此,时代的发展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进步,更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改革发展和中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大学逐渐开始形成一种共识:以文理学科环境培养人才,以广博的人文底蕴濡染人才。今天,中国正在弥补人文社会学科环境和教育的缺失,很多大学逐渐恢复或设置了一些人文社会学科专业,开设了一批人文社会学科课程。党和政府意识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教育部于2003年2月10日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宣布启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这样的政策导向和支持无疑有利于改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环境，为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局面提供了首要的学术空间。

中国农业大学是一所以农业学科、生物学科、农业工程学科见长的大大学，在学科发展和学生培养中深深感到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完善学科结构和提升学生素质的过程中，努力弥补着人文社会学科和文化氛围的不足。学校在总体发展规划和学科发展规划上，确定了“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的振兴与发展”的方针，专门设立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引导全校师生积极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资金上，拨出专款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鼓励发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组织体制上，科研管理部门中单独设置了人文科学处，成立了全校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委员会；在队伍建设上，大力支持人文社会学科人才引进和师生国内外交流。

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设立了“‘985工程’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专著出版专项”，为师生搭建了一个出版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专著的平台，鼓励师生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多出高质量的成果。这个专项也是展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面貌、传播中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精神与文化的窗口。从呈献在这里的学术专著丛书，可以感受到中国农业大学对发展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所付出的辛勤和努力。愿人文社会科学的朵朵奇葩盛开怒放！

何秀荣
2013年春节

前言

作为一名成长中的青年学者,我总是觉得我为自己提出的职业任务往往超出了自身的能力之外,因而也总是在文献资料、社会现实与职业诉求中徘徊着,总是需要赋予自己充分的理由与信心,才有可能将这种难以完成的任务尽力完成。

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便是这种困境中的产物。坦白而言,这本书的撰写大纲自 2005 年便设定好了,其主题侧重于探讨传播活动者的经济行为,查阅文献和调查中,发现这一主题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实在难以很好地完成(当然其中也包括时间因素)。其后打算以职业理想为核心进行撰写,继而又发现这项任务太繁杂、无法完成,即使是完成了也是勉为其难,后来又将重点放在舆论建设上,撰写过程中发现与我原来的调查主题距离较远,需要重新搜集资料,又作罢了。最先撰写的是第二章,原本打算将历史溯源中的外国部分和中国部分分两个章节撰写,苦于资料问题和时间限制缩减为一章,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其次撰写的是导论部分,对本书的结构、研究目的、研究路径、研究意义做了交代。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原本打算压缩为一章,然后集中主题撰写职业化特征,撰写中发现依然是资料欠缺,或者是一些话题无法充分展开,也就作罢,将重点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媒介职业化的变迁过程,分为两个章节完成,第四章、第五章则集中探讨职业理想与职业身份的确立与变迁特征,第

六章是进行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资料收集后进行的统计数据和资料的呈现与分析。第七章则与我近几年的研究重点有关,对于农民工媒介接触行为的研究、农民工获取信息渠道及其信息内容的研究常常令我思考一个问题:在技术变革促使的媒介类型的变迁中,媒介自身与社会阶层形成之间的关系如何?鉴于本书主题的关系,本章集中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就体制表达、公众表达和媒介表达之间的关系作了陈述,其目的主要是提出问题:在媒介职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体制表达、公众表达和媒介表达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媒介变革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责任,也才有可能为漫长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过程充分实现媒介的社会功能提供一种现实路径。同时,这一主题也潜在地隐含了社会阶层与媒介表达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市场中媒介还是体制内的媒介,如何将不同社会阶层所呈现的话语诉求较为平衡而公正地呈现出来,似乎也是媒介职业化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命题。

作者谨识

2010年10月6日北京

目录

导论 /1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3
- 二、现有研究资料回顾 /6
- 三、研究对象与主要研究内容 /13
- 四、研究框架 /19
- 五、研究意义 /20
- 六、研究方法 /23

第一章 历史溯源:中西方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化过程探寻 /26

- 一、西方媒介从业人员职业化过程 /27
- 二、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化过程 /51
- 小结 /68

第二章 媒介从业人员职业身份的革命化、政治化和社会化时期(1949—1993) /69

- 一、媒介的第一次转型与媒介产业人员职业身份的再厘定(1949—1976) /70
- 二、社会变革与媒介从业人员职业身份的反思与修正时期(1976—1993) /89
- 小结 /114

第三章 社会转型与媒介从业人员职业身份的多元化时期(1993—2010) /116

- 一、社会转型与政府转型 /117
- 二、媒介的第二次转型与媒介从业人员职业身份的混沌状态 /131
- 小结 /155

第四章 媒介从业人员职业身份的确立与职业理想的探索 / 156

- 一、职业身份与职业理想的开端(1978—1993) / 158
- 二、职业身份、职业理想与市场接轨时期(1993—2001) / 172
- 三、职业身份与市场资源交互时期(2001—2010) / 186
- 小结 / 201

第五章 当代职业媒体人的职业理想特征 / 202

- 一、从舆论监督、记录时代到社会启蒙 / 203
- 二、媒介专业主义的实践与探索 / 224
- 三、职业理想与市场呼唤：一种新的职业责任理念的兴起 / 234
- 小结 / 241

第六章 当代中国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态度与行为

(——来自北京市媒介从业人员的调查报告) / 243

- 一、职业认知 / 243
- 二、信息选择行为分析 / 251
- 三、经济选择行为分析 / 260
- 四、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化过程分析 / 270
- 五、信息来源与媒介从业人员的价值观 / 282
- 六、职业自律与媒介规范的“乌托邦” / 294

第七章 公众表达、体制表达与媒介表达中的文化建设如何可能? / 305

附录 / 342

附录 1 调查问卷 / 342

附录 2 访谈提纲 / 350

参考文献 / 351

后记 / 356



导 论

文化建设的路径：如何在公众表达、媒介表达与体制表达之间成为可能？

媒介工作成为一个职业、从而使媒介从业人员逐渐在制度化中开始职业化的过程，不仅与媒介自身的发展历程相关联，更与不同国家传播制度对媒介行业的管理、规范与制约密不可分。

随着大众媒介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兴起，媒介行业职业化的进程随之展开，大众化报刊的出现将媒介和市场连接在一起，出现了工业革命影响下的商业性媒介，如大众化报刊、私人通讯社等。这一时期的媒介从业人员的工作状态还停留在信息利润的商业诉求阶段，既与职业的自觉认知意识无关，也与社会责任意识无关，更与新闻的专业化意识无关。独立报刊的出现使得编辑记者开始摆脱媒介经营者和所有者的管束，逐渐成为独立的职业人员，新闻采访实践的普遍化、商业广告的系统化、公关行业对媒介行业的促进，合力推动着媒介的职业化进程。编辑记者在拓展了新闻报道范围的同时，将新闻工作的日常实践化与职业化联系在一起，使得媒介从业人员逐渐具有了独立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资格，在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也得到了在一定

程度的认可。

就中国而言,19世纪40年代的第一次鸦片战争、60年代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对外交往的方式,同时也是中国媒介大众化的发轫期。从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外文报纸、中文报纸,逐渐发展为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继而发展到后来的通讯社、电台以及电影等媒介形式,中国媒介在跌跌撞撞中开始了艰难的萌发过程。伴随着这种萌发过程,从事媒介职业的人员,逐渐从兼职人员变为专职人员,对这些专职人员的培训也开始从社会上的相关机构延展到大学的新闻教育体系中;不仅有专门的培训机构、研究机构和职业教育的逐渐兴起,还有著名的编辑、记者和媒介经营者的出现,到抗战前夕,中国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地位,几乎可以说获得了与医生、律师、法官等职业同样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誉,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也由此而跻身于当时社会的精英阶层中。

作为一个特殊的传播现场,战争和革命一方面将媒介职业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了,另一方面却又改变着媒介行业的职业理念。对抗日战争之后的中国媒介而言,民族主义的思潮刚刚过去,党派之间的斗争又迅速拉开,媒介的职业化与媒介生产的理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政治性的变化,无论是党派立场还是非党派立场,各方都无可避免带着各自的政治立场、文化立场或者是经济立场使用媒介手段进行宣传,近代中国媒介在经历了初期的宗教化、殖民化过程、经历了中国人自己创刊办报出版书籍的过程、经历了从党派论证时期之后逐渐进入商业化的过程,期间,战争和革命将商业化的痕迹逐渐削弱,同时将媒介的职业化拉入到特殊的传播机制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的传播体制的确立,媒介的商业化在新政府的早期改革中,逐渐消亡了。媒介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开始逐步进入行政化管理系统中,随着新的传播制度的建立,大众媒介体系便成为了政府宣传系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依照这一体制,是参照政府职员的社会身份来定位,职业已经不复是近代以来的职业内涵,职业理想

也不再是职业自身的独立思考,而是政治体制的附属品、政府信息的宣传员和扩大器。

伴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经济体制改革,禁锢了 30 余年的媒介体制,在或冷静、或盲目、或激情飞扬、或低落悲情的经济报道中,除了悄然改变着自身的产品实践模式、售后服务模式,也以独特的方式塑造着、并在某种程度上缔造着中国媒介行业的新型社会现场。介入这种新型社会现场的群体不仅仅包括大众媒介从业人员,还包括普通受众群体,这两个群体在信息传播的场域中、在不间断的信息角逐过程中,以种种合力改变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新闻传播系统的运作模式,这种新闻传播系统的运作模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更呈现出在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群体心理转型、社会结构转型中的新特点。这种新的特点在 21 世纪的信息传播场域中则得到新的拓展:网络社会的逐渐崛起、社会化媒体的日常化、普及化等,不仅将媒介、受众拉入了更为对等的信息传播系统中,政治组织、商业组织、文化组织乃至个人还以技术的力量,重塑了新的信息传播情境,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化问题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新型社会信息传播现场中,70 年代末期、80 年代中期、90 年代中期以及 21 世纪加入媒介行业的从业人员,尽管他们在职业理念和新闻实践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这些巨大的差异在信息的市场化、媒介的政治化和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呈现出趋同性现象。这种趋同性的表征至少说明了当代中国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理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模糊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以来的媒介与

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在拉近媒介与商业关系的同时,将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底线问题抛了出来。

一方面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实践在老一代媒介从业人员群体中所形成的对媒介行业的刻板成见,另一方面是新闻专业培训所赋予的专业知识与社会信息传播现场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是新型媒介技术对原有的信息来源渠道的冲击,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逐渐拥有了通过新媒体传播信息的工具和路径;一方面是新进入的媒介从业人员所拥有的理论化职业知识越来越多元化,另一方面是原有的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实践行为越来越低俗化和商业化;……如此种种,在这些现实面前,新老媒介从业人员不仅面临着对职业的重新认知,还需要面临职业伦理、职业道德、职业资格、职业规范等方面的重新学习。原有的职业理想尚未完全建立,对职业新的追问再度出现。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媒介的渐进式改革也在这种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参与了进来,并对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性、专业性和商业性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同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常化和普及化,拥有传播信息技能和条件的群体迅速扩大,无论是通过手机上网,还是通过互联网进行视频、文字的传播,原有的媒介从业人员的概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你、我、他掌握了最为普遍的传播技术,在网络上、手机上传播着个体化的信息,这些信息的传播业已影响到大众传播媒介原有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内容的选择、乃至产品生产过程。新媒介技术的运用也衍生出了大量新型的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位,这些职位的出现更多的是出于社会市场的需求,与学校的教育和培训并无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些职业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问题对原有媒介从业人员职业化和专业化进程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

加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蔓延,媒介从业人员的消费观念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职业的信息垄断性以及所衍生的庞大商业利益使得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认知也发生了变化。